



大学经典

〔宋〕朱熹章句

大学·中庸

金良年 导读
胡真 集评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中國
經濟

本
·
中
國



大学·中庸

[宋] 朱熹 章句

金良年 导读 胡真 集评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中庸/(宋)朱熹章句,金良年导读,胡真集评.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9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大学经典)

ISBN 978-7-5325-4610-7

I. 大… II. ①朱… ②金… ③胡… III. ①儒家②大学-
注释③中庸-注释 IV. B22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8460 号

责任编辑 方晓燕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大学·中庸

[宋]朱熹 章句 金良年 导读 胡真 集评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mm 1/16

印 张 5.5

插 页 4

字 数 100 000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4610-7/B·589

定 价 10.00 元

大学·中庸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含“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

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

“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7年1月

学庸

大中

导 读

金良年

《大学》和《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个单篇。“记”是古代门徒弟子记载宗师述论大意的一种体裁（当时把创造性的作品称为“作”，根据现有材料编写的作品称为“述”，孔子就自称“述而不作”），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听课笔记。后来，把学者阐发本学派理论的作品也称为“记”。《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礼类就录有“记百三十篇”，颜师古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大学》和《中庸》应该也包括在这些孔门后学阐述礼经和礼学的篇章中。到了西汉武帝时，戴德、戴圣兄弟曾先后对这些篇章进行整理，分别编有《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大学》和《中庸》就收录于现存的《小戴礼记》（后来简称为《礼记》）中。据东汉末年为《礼记》作注的郑玄《礼记目录》，这两篇都属于“通论”类，除此之外并没有予以特别的表彰和称扬。到了宋代，随着新儒家（理学）的兴起，出于构建理论体系和“道统”的需要，把这两篇和《论语》、《孟子》合称“四子书”（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著作，后来即简称“四书”），它们的地位才得到很大的提升。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确定科举条制，“汉人、南人第一场明

· 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元史·选举一》），这一制度后来被明、清所继承，逐渐演变为八股文取士，于是“四书”成为士人学子的必读之书。

二

在汉代，《大学》究竟出于“七十子后学”的哪一家之手，是个不明确的问题。宋代的理学家把它的著作权判给了孔子的弟子曾子一派，这在当时和后世都有人提出过疑问，当代学者中有认为它属于荀子一派者（如冯友兰），也有认为它出于思孟学派者（如郭沫若），近年来随着先秦古文献的陆续出土，《大学》的著作权再度提起，或有说作于子思者，或有认同曾子一派者，相互都难以说服。尽管著作权归属没有定论，但它确实是先秦文献是一致认同的。

《大学》的篇幅是“四书”中最短的，全文不到二千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段落，是一篇首尾基本完具的论文，因为该篇的开头有“大学”二字，所以用作篇名。

《大学》提出，“明明德”（彰明自身的美德）、“亲民”（亲爱民众）、“止于至善”（追求尽善的行为）是君子“近于道”的三项要求，而实现的途径则以“修身”为要，“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中心思想是“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从诚意为始”（唐孔颖达《礼记正义》）。这是汉、唐儒家学者对《大学》的理解。被纳入“四书”体系中的《大学》就大不相同了，理学家首先援引汉代的学制对“大学”的涵意作了新的解释，认为所谓的“大学”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君子达道从政之学，“人生八岁，

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熹《大学章句》序）。他们不仅在文字释读上竭力贯穿自己的思想，例如“亲民”，过去一般按字面解释为“大学之道在于亲爱于民”（唐孔颖达《礼记正义》），而理学家则认为，这里的“亲”应当读作“新”，是使民众自新的意思。他们把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上升为学习儒家理论的“三纲”，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称为实现“三纲”的八个循序渐进项目，简称“三纲八目”。为了突出这一理论纲领，他们借口收在《礼记》中的《大学》本子有错乱，将其重新析分编排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是“曾子立意而门人记之”，经首先揭明“三纲八目”，传则逐节予以解说，“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工夫”（朱熹《大学章句》），但原来的文本中能和释格物、致知相对应的传却只有“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一句话，而且理学家还认为，前一句是上一章传的衍文，于是朱熹在《大学章句》中为此补写了一节所谓阙失的传，藉此强化了“格物致知”在整个“三纲八目”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经过这一番从里到外的改造之后，《大学》成了儒家“初学入德之门”的必读书，“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朱熹《大学章句》）。朱熹在讲学中多次强调，“学问须以《大学》为先”，“《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地盘既成则可举而行之矣”，“《大学》是为学纲目。……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

国、平天下事”（《朱子语类》卷十四）。

三

《中庸》的作者，据郑玄《礼记目录》说是“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钱穆认为这是汉以前的旧说（《四书解题及其读法》）。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之儒”就是其中的一个派别（《韩非子·显学》）。《中庸》的著作权虽然在后世亦不乏争议，但基本归属于思孟学派是大致没有疑义的，问题在于它的文本不太可靠，一是它的名篇方式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文开头的二字为题，而是撮举文章的内容核心，这属于战国晚期的文体；二是它的行文中夹杂着一些可能在秦汉时代才可能出现的语词（如“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类），结构也不像《大学》那样严密。因此，一般认为，它可能是由几篇材料合编而成的，而且还可能经过了秦汉时代人的润色。

《中庸》全文近三千六百字，在《礼记》中也属于“通论”类，郑玄《礼记目录》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早在西汉时代就有单独疏释它的著作流传（《汉书·艺文志》录有《中庸说》二篇），后世续有所作，而宋代理学家把它编入“四书”，更在它的研究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书”中的《中庸》，其序列在《孟子》之后，而一般习惯于将它与《大学》并列则是因为这两篇的篇幅较短，书册装订时合为一册而形成的次序。理学家对《中庸》的改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全文脉络的重新梳理，把全篇划分为三十三章（在此之前各家对《中庸》的分章不一，唐代的《礼记正义》分

为三十六章，而宋人晁说之的《中庸传》更细分为八十二章），

“其首章子思推本先圣所传之意以立言，盖一篇之体要，而其下十章则引先圣之所尝言者以明之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复以先圣之言明之也，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则又皆子思之言，反复推说，互相发明，以尽所传之意者也”（朱熹《晦庵集》卷八十一《书〈中庸〉后》）。也就是说，《中庸》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至十一章，其中第一章是全文的总纲，“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第二部分是第十二至二十章，而以第十二章为枢纽，“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也”；第二十一章以下为第三部分，其最后一章是全书的总结，“盖举一篇之要而约言之，其反复丁宁示人之意至深切矣”（朱熹《中庸章句》）。改造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对一些重要的思想概念，如“天”、“性”、“心”、“道”、“诚”的重新阐释。这样一来，在汉、唐经学家眼中仅仅是“记中和之为用”的一般论述，上升成了“孔门传授心法”，“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朱熹《中庸章句》）。

然而，由于《中庸》文本的自身不整齐的缺陷，所以理学家的改造也感到很费力，朱熹曾感叹说：“《中庸》一书，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齐整！”所以当门弟子向他讨教研读《中庸》的方法时，他说：“《中庸》之书难看。中间说鬼、说神都无理会，学者须是见得个道理了，方可看此书，将来印证。”“某说个读书之序，须是且着力去看《大学》，又着力去看《论语》，又着力去看《孟子》。看得三书了，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问人，只略略恁看过。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难底。《中庸》多说无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参’等类，说得高，说下学处少，说上达处多，若且理会文义则可

矣。”（《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也就是说，《中庸》的研读在理学中属于“高级班”，初学者不易很快领会，但虽然难读，其重要性则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在延安研究哲学时，也曾对理学家阐述的中庸概念予以关注，他说：“依照现在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致张闻天，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载《毛泽东书信选集》）

四

在“四书”中，理学家对《大学》和《中庸》进行从形式到内容的改造功夫较大，所以朱熹为《论语》、《孟子》作的注释称为“集注”，意思是仅是综合前人的诸多解释断以己意，而《大学》和《中庸》则为“章句”。在古代的著述体例中，“章句”是一种对原典带有创意性释读的体裁，清沈钦韩《汉书疏证》说：“章句者，经师指括其文，敷畅其义，以相教授。”在理学家对《大学》、《中庸》进行改造的两种手法，即增减经文和对概念的重新解释中，较多受到后人指责的是增减经文，其中尤以重分《大学》经传和补写所谓“阙传”为甚。然而，在理学

家所处的宋代，“疑经”、“改经”是流行的学术风气，所以在当时看来也并不很“离经叛道”，而且当时及后来试图重新编定《大学》的不止程、朱一家，据清代毛奇龄在《大学证文》中所列有近十家之多，而且都自称是恢复了《大学》“真古本”的面目，清人所撰《四库》提要认为，这些改易“譬如增减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谓无裨于医疗，而亦不可谓即扁鹊、仓公之旧剂也”，只要“纲目分明，使学者易于致力”，“章句不易，使古经不至失真，各明一义，固可以并行不悖耳”（《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六），是比较中肯的。理学家之改造《大学》和《中庸》，确有其构建“道统”体系的学术需求，朱熹曾对学生说：“《大学章句》次第得皆明白易晓，不必《或问》，但致知、格物与诚意较难理会，不得不明辨之耳。”（《朱子语类》卷十四）由于我们现在阅读的《大学》和《中庸》，基本上是经过理学家改造的本子，因此，对此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五

最后介绍一下本书的整理情况。

按照丛书的体例，本书的正文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朱熹编定的《大学》、《中庸》的原文，一是朱熹的“章句”，还有就是我们选集的古人与《大学》、《中庸》有关的文字、评论。其中《大学》、《中庸》的原文和朱熹的“章句”，我们以宋代当涂郡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校以其他宋、元本，底本误者据校本径改，不出校记。

下面再谈一下我们选集的古人与《大学》、《中庸》有关的文字、评论的情况。

《大学》、《中庸》历来被视为儒家修身之学的纲领性教

材，在四书中，它们相比于《论语》和《孟子》，篇幅很短，理论性很强，几乎没有人和事的描述而显得有些死板。同时，其内容多是称述圣人君子的，所以后世诗文很少能化用其语句，这也体现了这两篇文字在过去的一种独特地位。

过去讲读书要“知其人”，我们今天读《大学》、《中庸》更要“知其文”。文义可以靠后人的注解发挥而得到，但其书在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符号化概念，其中的相关文字和内容用在哪儿、用于什么人才算得体，这就需要用更多的实例加以补充。因此，本书除了附以朱熹的《章句》让读者了解其基本的文义之外，还附了一些古人运用其相关语句的例子。

这些例子大约有三类。一是称颂类的诗文，主要是书、序、碑、启、铭等，用《学》《庸》中的一些话来称颂其德行是很高的待遇，其中还选了乾隆皇帝一首诗——算不得好诗，但太平天子之气毕现无遗。二是前人论学的文字，如《日知录》、《困学纪闻》等一些相关问题的讨论对今人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又有《徐氏笔精》一条专门讨论“蒲卢”的问题，对朱熹注提出异议，也可以让有兴趣者由此进一步探讨。三是将原文的词句当作成语来用，有与原意基本吻合的，也有有所变化的，如王褒的《洞箫赋》、查慎行的《金缕曲》等。此外还有一些小故事比较有趣，如杨万里“诚斋”的由来，《鹤林玉露》所记鹰报复人的故事等，也酌情收入。